



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

印度古代語言及 吐火羅文研究

葛維鈞 編

季羨林學術著作選集

本书出版得到了季羡林基金会的部分资助

季羡林學術著作選集



印度古代语言及 吐火罗文研究

葛维钧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古代语言及吐火罗文研究 / 葛维钧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6.10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
ISBN 978-7-5104-5898-9

I. ①印… II. ①葛… III. ①印度语支—古代语言—
研究②吐火罗语—研究 IV. ①H711②H21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9359号

印度古代语言及吐火罗文研究

编 者: 葛维钧

责任编辑: 张世林

审 读: 杨汝模

封面设计: 贺玉婷

版式设计: 张世林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04-5898-9

定 价: 6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印度友人顾明达向季先生赠送研究资料。



印度著名学者班固志先生拜访季先生。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树英

副 主 编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树英 刘 建 李 南

张光璘 葛维钧 薛克翘

特邀编委 张世林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编选说明

季羨林先生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长期以来，季先生的作品畅销于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这些作品大多为季先生各时期创作的散文。季先生一生创作出版散文集二十余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其中有许多精品脍炙人口，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散文家。但是，季先生毕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终生笔耕不辍，孜孜以求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对社会的主要贡献也是他的学术成就，散文只是他的一种“余兴”。

季羨林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涉及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其学术著作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糖史、吐火罗文研究等。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季先生的学术著作，深入浅出，联系实际，独辟蹊径，发人深省，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编辑了这套选集。本选集从季羨林先生的学术著作中，精选出论著二百余篇，辑为十二卷，依次为《印度古代语言及吐火罗文研究》（葛维钧编）、《印度历史与文化》（王树英编）、《印度作家作品评论集》（刘建编）、《佛教》（李南编）、《糖史》（葛维钧编）、《中印文化交流》（王树英编）、《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刘建编）、《东西文化比较》（张光璘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薛克翘编）、《学海泛槎——学术回忆录》（薛克翘编）、《回忆中国学人及文化问题新思考》（张光璘编）、《序跋集》（王树英编）。选集所选内容基本涵盖了季先生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所选论文皆为季先生在各学术领域中的代表作。

我们怀着敬仰和缅怀的心情编选这套选集，尽管我们殚精竭虑、费尽心力地收集、编选季羨林先生的文章，但仍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殷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会

2013年1月

目 录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	126
论梵文 tḍ 的音译	145
浮屠与佛	203
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220
再谈“浮屠”与“佛”	283
梅呾利耶与弥勒	301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自序

我开始研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在四十多年以前。当时我是德国格廷根大学的一名候补博士生。我的老师 Prof. Dr. Waldschmidt 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Mahāvastu) 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用所谓佛教梵语 (Buddhist Sanskrit) 或混合梵语 (Hybrid Sanskrit) 写成的。在研究佛教的学者中，这种梵语算是一门不冷不热的学科。有一些人在研究，但人数不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的老师之所以给我出这样一个题，其用意大概也就在这里。他问我同意不同意这个题目。我是一个初学者，门还没有进，更谈不上登堂入室，除了答应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同意之后，接着来的是长达三年的看书、搜集资料 and 进行写作的时期，这是一段只争朝夕的艰苦奋斗的时期。

在这三年内，我从对佛教梵语毫无所知，经过了渐有所知的阶段，在这方面的知识终于多了起来。我对佛教梵语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因此，在 1941 年我考试完毕后被迫留在德国的四年内，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又接连写了三篇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这些论文现在都收在《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这算是我研究佛教梵语的第一次高潮。

1946年回国以后，我既缺少应有的专著，又缺少必备的杂志，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不管我的兴趣还是多么浓厚，我的研究劲头还是多么大，却只好被迫搁笔。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了。我当时有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实际上，在佛教梵语方面，我根本就没有碗，更谈不上碗的大小，我只好用别的碗吃其他的饭了。

1956年，我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它丝毫也不能证明，我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书籍，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事实正相反，从1946年起到1956年这十年之内，我闭塞如故，与世隔绝，已经下定了决心，对佛教梵语的研究洗手不干了。1955年，我到民主德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曾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佛教梵语的著作，然而我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我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了。为什么事隔一年又写了这样一篇论文呢？原因是，当我浏览几篇国内外学者关于印度佛教史的文章时，忽然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利用他们使用过的材料，来解决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我想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材料不是新材料，问题不是新问题。可是把这些材料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却是第一人。如果说这篇论文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这里。这篇论文我曾在1959年缅甸研究会（等于科学院）的大会上宣读过，英译文就发表在会刊上。这一篇论文既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其局限性，包括引用书籍在内，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我写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也同样出于一个偶然的機會。一位研究印度语言的朋友告诉我，美国著

名的梵文学者爱哲顿 (Franklin Edgerton) 教授在他的大著《混合梵语语法》中提到了我用德文写成的那几篇论文，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连忙把他那皇皇巨著连同《混合梵语词典》借了出来，仔细阅读一遍。一方面我对爱哲顿教授的成绩感到钦佩；另一方面对于他的看法感到问题很多。于是情不由己地写了那篇《再论》。里面的例子几乎全是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旧例子，新的很少。但是行文的口气则颇为尖刻。讨论学术问题，本来应该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坦荡直率，与人为善，行文不要带刺，说话不要伤人。可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我当时对美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当权者对我国推行敌视仇恨的政策，我们对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感情，我当然不会是例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讨论学术的论文中，我这种感情竟自然流露地发泄到爱哲顿教授身上来了。这是不幸的，但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是一段长达二十几年的漫长的沉默时期。我吃饭的碗数目越来越多，一不愁碗，二不愁饭，我几乎想不到佛教梵语了。

1980年，我应邀访问了联邦德国，在我曾住过十年的格廷根城住了三天。这一座小城的城内，同我将近四十年前离开时，几乎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以前曾千百遍踏过的铺在地上的石头和石阶。我恍惚感觉到，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仅仅过了一夜，现在又回来了。今昔之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见到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老

师 Waldschmidt 教授和他那比他还大一岁的夫人，二老仍然健壮如昔。他们住在一座豪华的养老院里，看来物质生活方面什么也不缺少；但是此地实际上是一个死亡等待所。二老孤单苦凄，我心中无端凄凉起来，偷偷地抹掉了眼中流出的泪水。我的老师的接班人就是我在论文中屡次提到的 Prof. Dr. H. Bechert。我们是初次会面，但他盛情招待，亲自驾车陪我参观，临别时又送了我不少新出版的书，其中包括几册原始佛教语言座谈会的论文集。他还聘请我担任了《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的顾问。我把那些书都带了回来；但是怎样利用这些书，我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仍然有点漠然置之，无动于衷。

回国以后，看到那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有时忍不住技痒，随意翻看几页。我在上面讲到，我对佛教梵语已经决心洗手不干。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假象。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对佛教梵语并没有真正忘情，还有一棵还没有意识到的爱惜佛教梵语的幼芽在，一旦气候适合，这棵幼芽就会萌动。现在读到了召开原始佛教语言座谈会的记录，研究了座谈会上宣读的论文，我心中的那一棵幼芽真地萌动起来，大有要开花、结果之势了。

最近三年以来，我到外地开过许多会：到过西安，到过桂林，到过合肥，到过兰州。每一次出去，我随身携带的书中总有关于佛教梵语的论文集。每天凌晨，不论是面对着窗外的桂林山影，还是听到合肥稻香楼树丛中画眉的鸣声，或者听到西安丈八沟丛篁中的窸窣声，摆在我眼前桌子上，我潜心默读的总是这一部论文集。我就这样断断续续而又锲而不舍地读了三年。开头时，我对书中的一些论文颇感到有点新鲜。但是越读

越觉得其中有些意见极为偏颇，觉得好像是有意标新立异。我随时把书中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看法都做了详细的笔记。就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有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终于拿起笔来，写了间断了二十四年以后的第一篇讨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论文《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临时又补写了两篇论文，把我那未竟之意都收在里面，名之为《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这可以算是第二次高潮吧！

从笔调上来看，这几篇论文尖刻的程度似乎还要超过《二论》。《二论》尖刻的原因，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一篇《三论》情况完全不同，为什么还这样尖刻呢？说句老实话，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只是信笔所之，自然流露，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根本没有起作用。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原因或者根源。我这样做的根源何在呢？仔细分析起来，约有以下诸端：首先是，学术讨论要有充分的论据。但是，座谈会上的一些意见，论据是不够充分的。至于 Bechert 教授反对我的意见的那些意见，更是轻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 $-am > -o, -u$ 的问题就是如此。在他举出的书中第一行第一个字就是这样的语法现象，但是他却偏偏说根本没有，这真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其次，他在文章中使用的调子也过于轻率。这些我在文章中都已谈到，这里不再重复。最后，我总觉得，Bechert 教授等一些学者好像是有意标新立异。有此诸端，蕴积心中，发而为文，笔调在不知不觉中就尖刻起来。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心自问：我自己是不是

也陷入了这个泥坑，看到不同的意见而火冒三丈呢？经我再三检查，自己并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怎样，我相信，我这种尖刻还是善意的，是与人为善的。一个青年朋友说，这是我的文风。我认为，我的文风确有尖刻的一面；但也并不缺少温柔敦厚的一面。退一步说，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写得生动一点，似乎也无伤大雅。我同 **Bechert** 教授经常通信，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想他会理解并且谅解这一点的。

Bechert 教授和美国的爱哲顿教授，算是我的某一部分论点的反对派。我的《再论》是针对爱哲顿教授的，《三论》是针对 **Bechert** 教授的。是不是在世界上梵文学界中我只有反对派呢？也不是的。据我所知道的，世界上也不乏支持、鼓励我的学者。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的梵文教授原实博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在国际梵文学者的大会上发言，对我给予鼓励。在给我的信上，也给我以赞誉。对于这些隆情厚谊，我衷心感谢。我虽然修养不够，但还没有卑下到听到批评就发火，听到赞誉就飘飘然的地步。自知之明我多少还算是有一点的。不管怎样，国内外一些同行的朋友对我的鼓励，我看作是对我的鞭策。我之所以今天在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又搞起佛教梵语来，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是主要原因。我希望能竭尽绵薄，再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庶不致辜负他们的期望。

也许有人要问：费这样多的精力来研究佛教梵语，究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颇为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想直接同四化，同两个文明的建设挂上钩，确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宽，也确实能找出不少的用处。

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语言学，意在找出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发展的规律，蹊径独辟，成绩辉煌。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问题，往往注意不够，甚至不加注意。我研究佛教梵语几十年以来，不管成绩大小，环境如何，有一个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放弃，这就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我希望把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想法，最初 **Bechert** 教授也是赞成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讲到我那一篇论 **-am>-o,-u** 的论文时说，这能达到“有用的目的”(useful purpose)，能确定《妙法莲华经》某一个本子的产生地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后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硬说印度西北方言中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不管怎样，我不想随着他的转变而转变。我仍然坚决维持我原来的看法。我觉得，这一条路并非独木小桥，而是阳关大道。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我只恨自己走得还不够彻底，还不够深入，还不够细致。我相信，许多印度佛教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佛教梵语的研究而得到解决。除此以外，研究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言自喻的。

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够长了，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只希望，这些话能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些论文的背景和用意，让这篇自序不致完全成为蛇足。回顾我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条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几经波折，屡历风雨。但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我总算是坚持下来了。说到坚持下来所获得的成绩，我却只有脸红，

然而并不气馁。虽年逾古稀，但我仍然要说一句：希望在于未来。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内，在完成其他课题的同时，我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对佛教梵语进行探讨，希望能解决一些新问题，取得一些新成果。我在上面曾谈到两次研究高潮。我相信，在今后图书资料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在自己研究兴趣日益浓烈的条件下，必将有一个第三次高潮出现，而且是一个高于前两次高潮的最高的高潮。

1984年3月26日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现在印度正以极其隆重的仪式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我们都知道，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过影响。因此，有很多人关心这次的纪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面我从佛教史里选出一个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多少年来争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借表纪念之意。

巴利文小品 (*Cullavagga*) V.33.1 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